



唐宋八大家

吴小林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士萼

封面设计：李保林

唐宋八大家

吴小林著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125 字数：180,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

统一书号：11102·52 定价：1.05元

目 录

一、“唐宋八大家”名称的由来	1
二、唐代古文运动	7
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17
坎坷的经历，矛盾的思想	17
“文以载道”观和“不平则鸣”说	23
缜密雄健的论说文	28
鲜明生动的记叙文	38
婉曲深挚的抒情文	48
雄奇的散文风格和卓绝的语言艺术	57
四、柳宗元卓越的散文成就	68
抑郁而坚贞的一生	68
“褒贬讽谕”之说	76
深刻雄辩的议论文	82
精严生动的传记文	90
警策隽永的寓言	98
情景交融的游记	104
沉郁峻洁的散文风格	112
五、宋代新古文运动	118
六、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	131
刚正不阿的政治家，勇于革新的文章家	131

“穷而后工”说和“易知易明”论	134
委婉爽健的议论文	140
情文并茂的记叙文	148
寄慨遥深的抒情文	158
婉曲平易的散文风格	165
七、王安石和曾巩	173
改革家的斗争生涯，政治家的散文主张	173
刚劲的笔力，奇峭的风格	178
一个颇有政声、深于儒学的古文家	197
雍容平和之文	199
八、苏洵和苏辙	210
科举考试中的败者，古文创作上的名家	210
雄辩恣肆的散文	213
提倡“养气”说的著名散文家	224
汪洋澹泊的散文创作	226
九、宋代最杰出的散文家苏轼	237
政治家的悲剧和文学家的幸运	237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散文主张	242
汪洋恣肆的论说文	247
异彩纷呈的杂文	255
似诗如画的散文赋	266
挥洒自如的散文风格	271
十、“唐宋八大家”的地位和影响	278

一、“唐宋八大家”名称的由来

“唐宋八大家”，是指唐、宋时期的八个散文代表作家，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这一称号出自明代散文家茅坤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但茅坤的这个提法并不是自己的独创，而是有渊源的。远在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曾、王、三苏的作品编为《八先生文集》，这是把唐宋八个散文作家合称的最早说法。以后到了明代中叶，散文家唐顺之在他所纂的《文编》中，除收录《左传》、《国语》、《史记》等古文外，唐宋两代也只选取韩、柳、欧、三苏、曾、王的文章，进一步肯定了唐宋八家的地位。稍后的茅坤，最敬崇唐顺之，文学主张也和唐相似，就在《文编》的基础上，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钞》，正式地提出了“唐宋八大家”的名称。由于这书刊行以后，“家弦户诵”①、“盛行海内”②，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就一直流行至今。

“唐宋八大家”这一称号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

② 《明史·茅坤传》

当时文学斗争的产物，是为了表达一种散文主张而提出来的。

明代中叶，文坛上掀起了以李梦阳、何景明和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他们在散文方面主张“文必秦汉”，认为文章越古越好，秦汉以后无文。和这种是古非今的文学发展观相联系，他们在创作上提倡因袭模仿，法古拟古，如李梦阳提出作文要象写字摹临古帖一样来模拟古人的作品。这股盲目尊古拟古的形式主义逆流，完全扼杀了创作的生命，阻碍了散文的健康发展，因而在当时和后世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在“前七子”“后七子”之间出现的“唐宋派”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对派。他们以推崇唐宋古文，强调文章要有“真精神和千古不可磨灭之见”^①，来和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拟古主张相对立。唐顺之纂《文编》，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标榜唐宋八家的古文，就是他们反对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一个具体措施。其目的是举出学习典范，揭示入门轨涂，更好地推广唐宋古文，为贯彻其散文主张服务。正因为如此，“唐宋八大家”作为一个流派所标榜的称号，和“唐宋派”整个散文主张一样，既有其反对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进步性，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唐宋古文是秦汉古文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异常丰富的散文遗产中最为光采夺目的组成部分之一。“唐宋派”

① 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答茅鹿门知县二》

提倡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首先就把矛头指向了前后七子认为文章一代不如一代，秦汉以后无文的倒退的文学发展观。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中，否定“文章与时相高下”的看法，提出“时非所论也”，指出以时间的远近来衡量文章的好坏是不对的，这就对前后七子是古非今的文学思想作了有力的批判。其次，“唐宋派”推崇唐宋古文和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虽然都是学古，但是具体方法是不同的。“唐宋派”学古强调一个“法”字，如唐顺之在他的《文编序》中说：“不能无文，而文不能无法。是编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这个“法”，也就是作文的方法。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中评点八家文，也是为了揭示文章的法度规矩。通过掌握方法来学古，就有可能学到前人文章的精妙之处，并进而能自出其新，这比前后七子学古句拟字摹，食古不化，显然要进步得多。

但是，“唐宋派”用来反对前后七子崇古卑今文学观的武器是“文道合一”而又偏向于“道”的理论。这方面茅坤的话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在《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中强调：“文特以道相盛衰”。他肯定韩、柳的文章是“并寻六艺之遗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赞扬欧阳、三苏、曾、王之文是“要之于孔子所删六艺之遗，则共为家习而户眇之者”。可见他是以是否充分阐发儒家之道的标准来确定唐宋八家以及选择八家中的文章入书的，这种观点实际是唐宋八大家本人观点(个别人例外)的倒退，反而更接近道学家的文学观了，这就使他们在提倡唐宋古文时

不能不带上很大的片面性。同时，他们所讲的“法”，固然有如唐顺之所说的“神明之变化”^①的一面，即着重学习唐宋文的神情体态，领悟其精神命脉，但更多的还是指文章的组织结构，即唐顺之所说的“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的评语，也都是从文章的顺逆转折、首尾呼应之法上着眼。这样学古就往往只学得一些皮毛，并也带上一定的模拟色彩，由秦汉为窠臼变成以唐宋为窠臼，不能有力地展开对前后七子复古派的斗争。

另外，“唐宋八大家”的称号本身也有不够科学的地方，这一点也曾遭到过后人的讥议，如清代的袁枚就说过：“夫文莫盛于唐，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苏占其三。鹿门当日其果取两朝文而博观之乎？抑亦就所见所知者而撮合之乎？且所谓一家者，谓其蹊径之各异也。三苏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为三；曾文平纯，如大轩骈骨，连缀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又安得与半山、六一较伯仲也？”^②如果从全面总结唐宋古文成就的角度看，仅仅限制在“八大家”，甚至象后来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櫆所说“八家之外无文”^③，的确是片面的。同时，八家之中的成就也高低不一，很不平衡，其中韩、柳、欧、苏（轼）四家地位比较高，王、老苏和小苏次之，曾巩又次之。把曾巩这样的古文作者称为“大家”确是比较勉强

① 《文编序》

② 《小仓山房文集·书茅氏八家文选》

③ 转引自《唐宋八家文百篇序》

的。袁枚的意见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唐宋八大家”的名称一经提出，就为人们所接受，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直流行到今天，从主要方面看自有它合理的内核，是能够成立的。因为它以极其简练的五个字概括了唐宋时期八位互有联系而又独树一帜的著名散文作家，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散文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面貌。

唐宋八家有着大体一致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倾向，又有着不同的风格特色。他们都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和中心人物，共同反对骈体文，不满绮丽浮华的形式主义文风，提倡恢复和发展秦汉散体文的优良传统，不同程度地坚持了文道合一的方向（在“文”和“道”的侧重上各人有所不同），为把散文从骈俪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确立散句单行，自由书写，接近口语的新型散文——“古文”作出了贡献。他们的散文作品就是这种“古文”的典范，是唐宋古文运动的光辉结晶，体现了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也同中有异：在理论主张上“八家”有区别，甚至有交锋；在创作上，“八家”风格多样，异彩纷呈。首先唐代两家和宋代六家就具有不同的特色，大体说来，唐代两家之文雄健奔放，奇崛简峭，宋代六家之文平易通顺，委曲婉转。其次，同属唐代的韩、柳，同属宋代的欧、曾、王，甚至文风比较接近的苏氏父子，也各有特点。宋人李涂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①清人吴振乾说：“奥若韩，峭若柳，宕逸若欧

^① 《文章精义》一七

阳，醇厚若曾，峻洁若王，既已分流而别派矣。即如眉山苏氏父子兄弟相师友，而明允之豪横，子瞻之畅达，子由之纾折，亦有人树一帜，各不相袭者”^①。这些评语不一定确切，但他们指出八家的风格不同是很对的。的确，韩愈的雄奇，柳宗元的峻洁，欧阳修的委婉，曾巩的醇厚，王安石的劲峭，苏轼的恣肆，苏轼的豪放，苏辙的澹泊，都自成一统，反映出了八家流分派别、绚烂多姿的面貌。把这样一个既有联系又各有特点的散文作家群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基本上是名副其实，言之成理的。

唐宋古文运动，是我国散文史上的一场革新运动；唐宋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继秦汉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因此体现着唐宋古文运动的光辉结晶，标志着唐宋散文最高成就的“唐宋八大家”散文，无疑是我国丰富的散文遗产中的一份宝贵财富。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优秀遗产，古为今用，以推动今天的散文创作乃至一切文字工作，就必须很好地研究和探讨“唐宋八大家”的散文。

由于“唐宋八大家”的称号是和唐宋古文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谈“唐宋八大家”，当然首先就得从唐代古文运动讲起。

^① 《唐宋八大家类选序》

二、唐代古文运动

在我国的唐代，曾掀起过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学斗争，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由于参加这场斗争的人很多，他们有相似的主张和共同的目的，并通过理论宣传，创作实践，广泛交游以及建立师承关系，相互支持，彼此援应，形成了一股潮流，经过斗争，最后获得了成功，所以在文学史上被称作为“古文运动”。

“古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在唐代最早见于韩愈的文章中(如《题欧阳生哀辞后》、《与冯宿论文书》等文中均可见)。这种文体直接继承先秦两汉散文的传统，散句单行，自由抒写，和讲究对偶、声律、藻饰、典故的“今文”——骈文相对立，所以叫作“古文”。

作为古文对立物的骈文，是秦汉以来在辞赋和散文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它起源于秦汉，在魏晋正式形成，到南北朝大盛，成了文章的正宗。骈就是两马并驾的意思，在句法上讲平行对偶是骈文的最大特点。另外，它还规定句子有字数的限制，一般是四字句和六字句(所以骈文又被称为“四六”文)；要求字句音韵协调，平仄相对；讲究用典和词藻的华丽。骈文形式上的这些格律要求，起先是为了加强文章的艺术效果，给人以整齐匀称的

美感，使语言富于音乐性，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并使文字色彩鲜艳秾丽。一些优秀的骈文，除了思想内容可取外，也确实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和独特的风格。如庾信的《哀江南赋》等作品，写得情真意切，哀婉动人。又如吴均《与宋元思书》中的“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都写得音节和谐，文字优美，有较强的表现力，成为历代传颂的名句。骈文对唐宋以后的律诗和散文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以，骈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对丰富我国文学遗产的宝库作出过自己独有的贡献。但是，骈文有一个先天性的致命弊病，就是它过分注重形式的美，而忽略文章的思想内容。所以发展到后来，原本为提高艺术效果所规定的一些格律限制，反而成了表达内容，增强表现力的束缚。越来越繁琐的格律要求，不仅使文章平板滞涩，重复拖沓，而且难于自由抒写；用典过多，容易有掉书袋的毛病，使人感到晦涩难懂；过分追求词藻的华丽，造成了文风的纤巧萎靡和语言的脱离生活实际。这种既不易写又不易懂的贵族化文体，已经成了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桎梏。从南北朝到唐中叶的长时期内，不仅文学性的散文用这种文体，而且连书札、奏议等应用文也是如此。这种骈体文垄断一切文字领域的状况，严重地阻碍了我国散文的健康发展。因此，从骈体文的鼎盛时期开始，就不断有人反对这种文体，主张恢复先秦两汉时的散体文——即古文运动中提倡的“古文”。这种“古文”单句散行，长短参差，不受对

偶和音韵格律的限制，能够自由抒写，也没有堆砌词藻典故、晦涩难懂的弊病，语言朴实明朗，比较接近口语。这样的文体在叙事、议论、抒情等方面，要更为自然生动，也更容易为广大的读者所接受，比之骈文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骈文的末流不仅形式僵化，而且内容空虚贫乏，主要是反映统治阶级及其文人学士腐朽糜烂的生活和空虚颓唐的精神状态。这种状况引起了关心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主张维护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既反对骈体文浮艳纤巧的形式，更不满骈体文空洞无聊，背离儒家传统思想的内容。他们倡导古文运动，不仅是为了“复古文”，恢复先秦两汉文章散行参差，自由抒写的特点，而且是为了“复古道”，即恢复先秦两汉散文宣传儒家思想的传统，以便重新确立儒家思想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正统地位。

总之，古文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单纯改革文体、文风的运动，而且是政治性很强的儒学复古运动的组成部分。

古文运动，虽然从形式到内容都打着“复古”的旗号，虽然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复古主义色彩，有着某些盲目尊古崇古的弊病，但就其主要性质来看，是一场革新运动。（首）先，它之所以提倡先秦两汉的散文，否定当时的骈文，是为了去除积弊，使文章能更好地反映现实，表达思想，这本身就具有革新意义。（其次），从主要方面看，这种“复古”并不是一味拟古，恢复到和先秦两汉散文一模一样的地步，而是经过批判继承，有所取舍，创造出一种和先秦

两汉散文既相承袭，又有发展的新型散文——“古文”。这种散文在形式上不是恢复到先秦两汉经传子史的写作样式，而是比之更为活泼自如，富有表现力和文学色彩。在内容上所宣扬的“古道”，也并不和原本儒家的“道”完全相同，而是经过站在不同政治思想立场上的古文家们改造过了的儒家之“道”，其中甚至还包括非儒家思想的成分和对儒家思想的突破，具有新的内涵。这种革新精神，正是唐代古文运动区别于宋以后一些复古主义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唐代古文运动，是指发生在唐代中叶贞元、元和之间，由韩愈、柳宗元领导的散文革新运动，但是它又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和相当长的酝酿准备时期，这就要追溯到骈文鼎盛时期的南北朝。

早在北朝的西魏，就出现了反对骈文浮艳文风，提倡写作古文的尝试。苏绰仿照《尚书》的文体写了一篇皇帝祭庙用的《大诰》，以后朝廷就规定文笔都依这种格式写。但《尚书》体佶屈聱牙，古奥难懂，离开口头语言更远。这实际是以一种形式主义代替另一种形式主义，结果变革并没有成功。到了隋朝，华艳的文风，又有所发展，并扩展到了应用公文的范围。隋文帝杨坚便想以行政手段来强制改变这种情况。他在公元五八四年下令，公私一切文字，都要“实录”，不许用浮华的词句来写。这年九月，有个泗州刺史叫司马幼之的，就因为写的文表词句华艳而被判罪。为了和这些措施相配合，当时有个官吏李谔，又上书给隋文帝。他指出六朝文学是：“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

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①。对这种绮靡文风作了猛烈抨击，并主张进一步通过政府命令来加以改革。由于他们只是否定华艳的文风，没有触及骈体文这一产生华艳文风的根源，又缺乏群众基础，所以收效并不大。但以上这两次改革的尝试，毕竟是对骈文华艳文风的最初冲击，可看作是古文运动的最早历史渊源。

到了初唐，一方面六朝以来的绮靡文风的影响还很大；另一方面已出现了反对这种不良文风，要求复兴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强烈呼声，初唐“四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杨炯曾批评当时文章“骨气都尽，刚健不闻”^②，对这种雕琢纤弱的弊病表示不满。王勃也慨叹“天下之文，靡不坏矣”^③，要求改变这种状况。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要有效地改变文风就必须改革骈体文这种文体，而是主张折衷调和，想在不改变文体的情况下革除文弊。王勃、骆宾王等人的一些著名作品，如《滕王阁序》、《讨武曩檄》等，就是用骈文写的；并且他们有时还仍旧沉溺于绮艳的时风中，出现了创作实际和理论主张相矛盾的情况，这就大大削弱了他们改革文风的彻底性。只是到了陈子昂时，这种情况才有了显著的变化。陈子昂是初唐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他更多的注意力是在诗歌革新方面，没有单独发表什么古文主张，但是他提出“风雅比兴”和“汉

① 《上隋高祖革文华书》

② 《王勃集序》

③ 《王子安集·上吏部裴侍郎启》

魏风骨”^①，强调文学要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和刚健清新的风格，也包含着对散文的革新要求。更重要的是，他在散文的创作实践中，写出了疏朴的古文，使当时的文风为之一变。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②陈子昂是唐代古文运动最早的先驱者。

进入盛唐、中唐后，上继陈子昂，经古文家萧颖士、李华(唐玄宗时代)、独孤及、元结、梁肃(肃宗、代宗时代)和柳冕(代宗、德宗时代)等人的努力，在奠定古文运动理论基础和古文写作实践两方面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从而开启了韩、柳古文运动的先河。首先，他们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进行了抨击。如独孤及指出当时的骈体文是：“有饰其辞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偏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桎梏，拳拳守之如奉法令”^③。尖锐地批判这种忽视内容，片面讲究词藻格律的绮靡文风。第二，在思想内容上进一步以儒家经典为榜样，提出文章要宣扬儒家思想，发挥社会教化作用。萧颖士说他自己“经术之外，略不要心”^④，柳冕认为“文章本于教化”^⑤。第三，在文体的改革上，提倡写作古文，用以代替骈文。他们所推崇的古文的具体涵义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是指先秦两汉时代的散体文。如独孤

① 《陈伯玉集·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② 《荐士诗》

③ 《毗陵集·赵郡李公中集序》

④ 《赠韦司业书》

⑤ 《与徐给事论文书》

及就认为先秦的儒家经典和两汉的贾谊、司马迁、班固的文章，是古文的典范。这些古文家在写作实践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萧颖士诸人都已变骈偶为散体，写了不少古文，只是“明而未融”，缺乏特色，成就不高。其中较为出色的是元结，他的愤世嫉俗的政论文和清新秀逸的山水园亭游记，是后来韩愈的杂文和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的先声。不过他们理论上过分强调尊崇儒家经典，道学气显得很重，而对文章的艺术性有所忽视。加上这些人写作上还没有完全摆脱骈俪习气，才能又不高，古文创作成绩并不太好，正如柳冕所说：“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①所以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有声势的散文革新运动，而和初唐一样，只是为古文运动作了酝酿准备。到中唐贞元、元和期间，韩愈、柳宗元才在这个长期酝酿准备的基础上，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掀起古文运动，并取得了胜利。

古文运动在中唐时出现并获得成功，除了文体发展本身的因素和有着长期的酝酿准备过程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

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从我国封建社会的顶峰跌落下来，由繁荣走向衰败，从此一蹶不振。贞元、元和时期，虽然政治上相对稳定，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旧史家所谓的“中兴”局面，但实际上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内外矛盾并没有缓和，而是仍在发展。当时土地兼并现

① 《答荆州裴尚书论文书》